

青年時獻身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心抉擇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被新儒學老師的文化情懷

記得新儒學大哲唐君毅老師於1978年2月2日去世時，唐師母告訴我：「唐老師當天聽聞中國學界已重新確定孔子地位，他十分欣喜，當晚即溘然長逝。」唐老師去世前幾年曾十分痛心，因1974年文革後期批孔運動，其後鄧小平撥亂反正，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相繼探討孔子思想的積極意義。在這重建中華民族文化的大時代來臨時，一代儒學大師去世，帶着對新時代中國的無限期盼。記得1976年他退休演講時，流淚指出，面對中華民族文化百年來的艱困，年青知識份子須「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預備自己充實的人格學問，只要有機會就貢獻祖國。中國文化必細水長流，成為活水江河。

1982年4月，另一儒學大師徐復觀病危，我們幾位在大專任教的碩士畢業生看望他，他在床上抓住我們的手，說：「將來中國文化的學脈，要靠你們繼續開展了。」

那年代中國正一步步重建文化精神價值，1982年6月我到美國夏威夷留學，追隨方東美學統大弟子成中英老師，亦在朱子學會議得拜會另一大師馮友蘭，並認識中國新一代學者張立文和李澤厚，之後在哈佛認識同輩年青學人陳來。是他們在國內重建中國文化。1984年9月22日，中國孔子基金會在曲阜正式成立。這標誌孔子從被批判的對象轉回到了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代表的高度。

1990年，我離開執教十年的浸會大學；應邀赴加拿大維真學院開設中國文化研究部。彼時神州大地改革如火如荼，我時刻思索海外華人當如何貢獻。面對異邦的文化隔閡與內部的人事爭端，我不屑於權力傾軋。一九九四年於加拿大溫哥華首先建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之後相繼

在美國、香港也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並創辦《文化中國》學刊，致力於中西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交流，以支援中國學界發展中西文化研究，擴展全球視野，尋求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並奔走呼籲香港和北美華人，支援中國文化重建及貧困兒童獲得教育，得到了無數海外中國人投身支持。

在90年代中回國開會，見滿街洶湧的自行車群，每一同胞的樣子都看得很清楚，帶着純樸的泥土氣息。我含淚思考，中華民族文化經歷百年被外國欺凌掠奪的創傷，新時代須要醫治和重建。1994年我在中國大地上決定了下半生的方向和使命，100%愛護和重建中國民族文化，繼承由唐君毅到成中英老師的使命和理想，一面為這時代建立精神文化價值，復興中國古代聖賢揭示的良知仁愛及和諧之道。一面吸納世界先進的科學科技、理性運作和正義博愛的思維，建造富足、強大、公義、慈愛、人人有尊嚴的體制。

兩大挑戰

在我立志獻身中國時，遇到兩大挑戰。

1989年後，我先後在香港及北美華人電台評論時政，受到不少聽眾支持，也因此有機會接觸美國政界。當時，我曾獲邀參加華盛頓的總統早餐會，聆聽克林頓總統與戈爾副總統演講，並與國會議員交流，了解美國政治制度與文化。期間，一位美國政治基金會代表私下與我接觸，表示若我願意在中國推動民主運動，將可獲得相當可觀的資助。對當時的我而言，這確實是一條看似光明而安穩的人生道路。由於我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對美國社會有一定認識，也明白若選擇這條路，未來或能得到更多資源與發展機會。但作為有經驗的評論員，知這工作的背後，是美國

在政治上企圖改變甚至摧毀中國，或使中國為西方代理人的行動。這挑戰違逆我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我良知很清楚，決不可為利益做賣國的漢奸，須拒絕外國的資助和操控，寧願投身與艱苦奮進的中國人民同行。

從此我選擇了人生下半場，就是用無條件的愛對中國，這不止是愛護國家民族文化的抉擇，且是領受天地仁愛的一種領悟，我曾經歷過深刻的宗教靈性境界，體悟人須百分百行出愛：愛國家、愛民族、愛文化、愛人類。不管中國發展好不好，我仍願意作出任何犧牲，以無條件的愛去獻身報國。

這抉擇使我拒絕站在西方立場去審判中國，卻要盡一切知識和才學，與中國同胞同行，參與這偉大的改革重建事業，使中國人不再受列強欺凌。且在海外要全力維護中國，講出中國真相以破除西方的抹黑。若要對中國作出批判和建議，則在內部以溝通渠道向政府直接反映，絕不被仇中反華力量利用。

其後不久，我又面對第二大挑戰。當時香港一間主流媒體的總經理親自前來邀請，希望我回港主持晨早評論節目，並提出相當優厚的待遇。以三十多年前而言，那是一份足以改變個人生活條件的高薪工作，也可能帶來名氣與財富。但我知道以那時的社會形勢，必要求我去批評指責中國，那將使我不能回國參與改革建國大業。

我深思人生的意義，這收入或可使個人得富足，但心裡有不安，因見祖國發展仍是困難、體制未健全，貧困人口龐大，我不能只求自己成功。我寧願放棄個人富貴的機會，而回國與全體人民同甘共苦，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前途開創出一條新路。

推動廉政文化

1994年創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我的宏大理想在經濟大流中，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價值。同時推動民族復興，須解決國家具體問題，一是腐敗猖獗、二是農村的貧困。

如何支援政府的反腐及脫貧呢？我在1995年開始探討如何建立廉政文化，有機會認識香港首富之一新鴻基地產郭炳江先生，向他訴說國家發

展的需要，郭先生有愛國情懷，馬上捐出一筆資金，我即與上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聯絡，得姜義華教授合作，資助當時中國最強的智慧庫團隊，深入研究反腐倡廉，並派多位學者和官員出國到加拿大考察，與加國 Douglas College 的政治和法律哲學專家歐陽光衛教授合作。那時加拿大卑詩省華人省督林思齊馬上大力支持提倡，總理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 和中國關係良好，加國也出資合作，派華人部長陳卓愉參與，在兩地開會探討，參照西方的獨立審計制度，研究建立對付腐敗的體制。

這次廉政研究使海外華人和中國合作無間，在中西交流中成功讓西方主流學界和政界正面理解和支援中國的發展，復旦大學完成初步研究後，我們的合作完成，算是盡了炎黃子孫報國的一點綿薄之力。

90年代到21世紀來臨，祖國反腐大業迅猛開展，到2012年十八大後，習近平在全國各級推行「打虎拍蠅獵狐」行動，終於2021年6月28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時，中央紀委副書記肖培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反腐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因為已經構築起黨統一領導反腐敗鬥爭的體制機制。回想90年代為國家的憂思，至今國家終已完成反腐法治體系。

深入農村支援教育

我在1996年開始關注農村貧困問題，後到北京民政部見前政協副主席閻明復，他退休後做民政部長，談到我對貧困人民的關愛，他安排我到河北赤城縣考察。官方車子帶我出北京，在路上見很多山西運煤車迎面而來，經過一些坑窪不平公路上的顛簸，總掉下一些煤塊，見路邊貧困農村一少女待在那裡，馬上冒險到路中心撿拾，放在一大籃子中，收集一批即可以帶回給家人需要，也可賣出幫補家用。其後上山去赤城縣，其中過河時見橋已斷，車子跨河水過去。縣城的學校都殘破不堪，窗口無玻璃，貼了報紙封住，但報紙又被風吹破。不過見孩子都純良可愛，是祖國的未來。這農村貧困景象深深震撼我心。

後來政府安排我帶一些海外華僑到廣西資源縣，和貧困學生談話，我說我們團隊從加拿大花

12小時飛香港，再2小時飛桂林，再坐車5小時來山中看望大家，是因為我們愛每一位同學，大家雖不認識，但因大家同是中國同胞，雖然陌生也可彼此相愛。同學們盡都流淚，抱着我們哭，因他們都是留守兒童，父母去大城市打工，不在身邊，我們的愛和擁抱，就像親人一樣。

我們團隊也感極而泣，決定資助他們讀書，回加拿大後向華僑分享所見，以後每年都有千人支持籌款晚宴，再擴展到香港和美國華僑，大家都產生愛國情懷，每年籌得數百萬人民幣，支持廣西及雲南多個縣城，每城兩至三班高中生，2025年已資助超過二萬人次青少年完成教育。我們團隊的子女們亦受父母影響，暑期到農村免費教同學英語，同心建國。至今畢業生有成為北大博士後科學家、醫院院長、銀行行長、城市局長、企業高管、愛心老師等等，我們都視之如自己子女。

轉瞬奮鬥已三十多年了，中國文化已復興，且體制清廉，農村脫貧，中國經濟和科技達世界高位、政治建立了全過程的協商性民主。我甚欣慰，神奇的是，我和愛妻的樣子和身形與三十年前相若，沒有老化，或許是大家一心為了中國，內在靈性燃起了永不熄滅的仁愛之火。